

2290 100.21
毛澤東活頁文選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在目前階段的任務**



華北聯合大學教學務處選印

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由於中日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階段。

(一) 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鬥爭中——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造成了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及民族與民主革命任務不能不由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二) 九一八事變及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1、由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爲特別突出特別尖銳化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和實行着完全殖民地化與獨佔中國的強盜征服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並且也在社會主義蘇聯與日本之間，則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現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世界的和平陣綫相結合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綫是抗日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中國與蘇聯應該聯合起來。

MG
A424
48



3 2167 5386 7

2、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發生了他們的存亡問題，而逐漸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發展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與法國人民陣綫有區別的抗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綫的任務，並指出了這種任務有完成的可能，而且必須完成之。我們的統一戰綫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3、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情況與政策。人民是更大規模的起來為救亡而鬥爭。共產黨繼續『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蘇區，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與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份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春天開始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及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等等我們的主張與積極努力之所由來。

4、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與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與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與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于其他帝國主義站在他們自己的利益上，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5、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

，使他變爲次要與服從的東西。但國內階級矛盾與集團矛盾本身的内容依然存在，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與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之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解決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與必須解決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敵的總任務。這就是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外國和平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三) 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宣告結束了。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上海與青島的反日罷工，英國對日政策趨向比較的強硬，兩廣事變，綏遠戰爭與綏綏運動，南京在中日談判中較強硬態度，實際上起了承上啓下作用而成爲時局轉變關鍵的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的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與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正確的動員口號，即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一任務是基本上完成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實際組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四) 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他們內部有親日派與動搖派的存在，沒有表示他們政策的明確與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的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與國民黨內部的

變動，使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與抗戰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我們的即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這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也可以看出來。今後的問題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抗日與民主的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份子，推動動搖猶豫派份子，而排除親日派份子，才能達到目的。

(五)目前的階段，即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到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之時的階段，是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與後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和平，則後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民主。如果前一階段裡和平的取得，得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則後一階段裡民主的取得，將構成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在為着抗日救亡的總目標而努力於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祇有由於他，保衛祖國的任務才能達到）的時候，必須知道沒有國內和平固然是不行的，沒有國內民主也就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與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而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實現與取得徹底的勝利以保衛中國與收復失地，也就將成爲不可能。

爲民主與自由而鬥爭

(六) 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日德意同盟條約的訂立，二十八萬萬元預算的通過，議會的解散，滿洲的增強，都是向着這一目的。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與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足證明戰爭前夜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問題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燃眉的急迫性與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無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東西，必須迅速清除乾淨。

(七) 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須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對於它們的準備工作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爲保證抗戰勝利的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

主要的是因爲內部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因此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八)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一黨一派一階級的獨裁專制政體，變爲各黨各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國民大會選舉與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改變爲民主的選舉、與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爲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的鞏固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增強國內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爲隨時能够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份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與製定憲法問題上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與憲法運動，嚴厲的批判、推動與督促當權的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非民主的限制性，採取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而使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放在國民大會與憲法之民主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與收復失地的勝利。當

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上的某些最低限度之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與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綱領上的重要一部，同時也就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獲得真正的堅實的建立之必須條件。

(九)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斯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與對日抗戰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每一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運動。當我們現在與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的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任務達到目的。今後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及人民落後成份做努力的宣傳鼓動與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與托洛斯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與堅決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一〇)爲了和平、民主與抗戰，爲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2)在蘇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須的與許可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在根據於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在政治比

重上的變化而必須改變的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的狀態這一原則之下，得着新的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拿這種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與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合作為製每敗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不是阿Q主義，就是惡意的污蔑。

(一一) 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為同共產黨合作與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發動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勝利的大革命。又曾經因為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實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國家於危亡的地位。現在則因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的統治下去，全國人民與國民黨中愛國份子，因而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與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的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

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爲徹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則是基本上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爲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一二) 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沒有錯的。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變爲人民的敵人，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而遭受了失敗，則革命的成份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黨派，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派的肩上。僅僅共產黨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保持了革命的傳統，提出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爲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他是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份子，他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裡的特點，就是因爲資產階級在今

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不拒絕他們，而應該極力招致他們，與之恢復鬥爭的聯盟，利於中國革命的轉向前進。爲消除國內的武裝對立，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民主共和國過程中，用立法的手段及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暴動沒收方法過渡到新的適當方法上去是必要的。

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與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一三)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與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增強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與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國內戰爭，黨派對立，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與不利於抗日救亡的經濟條件等等），而保存其有利於團結抗敵的部分（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之改善等等）。

(一四)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任務之下，紅軍與蘇區的任務是：(1)把紅軍提高到適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爲此目的，紅軍即改組爲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教育，提高到超過自己現狀及一切國內軍隊的水平之上，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蘇區改變爲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的組成部份，實行新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搗亂份子，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與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4)以肖咸文盲為目的，實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一五)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够參加反帝與反封建制度之中國資產階級（正確點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會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與徹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經驗，証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着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時；革命是如何的推向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無產階級政黨負責）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時，革命又是如何的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是不宜於重複的。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有任何成就。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資產階級還帶着更多的被動性與保守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慷慨接受，就是證據。因此，就更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的。

(一六) 無產階級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階層的政治領導，是怎樣去進行的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與爲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與每一重大事變當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基本的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爲全國行動的總目標與具體方針，沒有這種目標與這種方針，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目標與具體方針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使它們的先鋒隊——共產黨員，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與忠誠，成爲執行這些方針的模範。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得到羣衆的愛戴，依靠羣衆的多數。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與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密性，共產黨對全國的政治領導，是由實現上述這些主要的條件去進行的。這些條件的增進與創造成

功，是保證自己政治領導的基礎，是使革命進入澈底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犧牲的前提。

(一七) 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爲執行兩個政權對立路線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與工作方式，應全部轉變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路線的方面去，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秘密的轉到公開的，單獨的轉到與同盟者合作的。從這樣兩種基本上不相同的東西的中間執行全部工作的轉變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從新去認真學習的。從新訓練幹部，成爲主要的一環。

(一八) 關於民主共和國性質與前途的問題，從許多同志中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因爲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世界革命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條件，它雖一般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國家性質，但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應該是一個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因此，它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存在着健全轉變到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

(一九) 向着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同時又向着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須條件。黨內在民衆運動中，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反映，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爭

取羣衆多數的惡劣傾向。肅清這個傾向於每一具體任務的工作中是必要的。我們的口號，是依靠多數與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必然將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口號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爲達到反對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必要的，只有這種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途的南

針。

一九五三年 四月廿 八日

人大贈

